

德國和中國建交以來的中國政策 — 以梅克爾總理時期 (2005-12) 為主

郭秋慶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要

德國慢於英國和法國遲至 1972 年才和中國建交，德中雙方無地緣戰略關係。梅克爾總理主政下，由於德國有強大的製造業，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下市場廣闊的誘因，令德國著眼於增進雙方的經貿往來，進而也有文化的接觸。其次，德國是歐盟國家中，對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和科技關鍵的供應國，迄今已經發展成德國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國，德國也被中國作為經濟和政治上通向歐洲的渠道。不過，德國對中國的投資，主要抱怨的是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法律不確定性、服務業限制、貪污以及缺乏透明性等。無可否認，梅克爾總理對中國展示空前的價值觀外交，值得稱道，不過梅克爾還是著重德國的經濟利益，有時還會不太考慮歐洲的共同戰略利益。

關鍵詞：德中關係、梅克爾總理、德國的中國政策

壹、前言

中國在亞洲和全球舞台的重要性增加，除了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它直接參與所有當前國際事務的決定，例如有關敘利亞、黎巴嫩、伊朗以及對北韓的政策和其他令人困惱的地區。自 2010 年夏季以來，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回顧中國改革開放到 90 年代底，對外貿易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由早期的 360 億美元升到 3,000 億美元以上，增幅超過 10 倍¹。2001 年為了整合進世界市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許多經濟部門自由化，加上其有利的生產環境、十分低廉的勞動成本以及內部市場的廣闊，吸引不少國家的投資。

依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10 年 1 月中國已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2011 年中國和德國的貿易額達 1,900 億美元 (1,440 億歐元)。從 2002 年起，中國已經是德國在歐洲之外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排在美國之後與在日本之前；反之，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國，居中國貿易夥伴國的第 5 名。若就雙邊投資而言，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和眾多人口的財富增加，成為外國投資的最有利的誘因，2003 年中國首次成為全球吸引最多海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擠下長期執牛耳的美國成為第二名 (Frey, 2005: 49-54)。若謂德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約 260.8 億歐元；反之，中國企業對德國的投資迄今約 8 億歐元，5,000 家以上的德國企業為市場機會進入中國，許多是機械工具業公司，也有進入工業和基礎設施，提供高科技水準的機械和設備，最近德國企業已經發現中國的消費市場；反之，中國企業在德國設立分公司約 1,300 家，例如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它在德國設立歐洲總部和研發中心。

有鑒於先進的德國與發展中的中國關係密切，本文從雙方建立外交關係著手，分析雙邊主要互動面向的發展，特別以 2005 年德國梅克爾總理主政時期，作為深入探討的關鍵，以便了解當前德中關係的實質內涵與意義。

¹ 依照中國官方資料，1995 年到 2004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平均 8.5% (張莉, 2013)

貳、德國和中國政經關係的成長

一、雙方逐步地實現外交關係的建立

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嘗試和德國（當時是西德）建立正常化關係，德國的反應是負面的，因為它不願意和那些承認東德的國家建立雙邊關係。不過，德國作為西方世界第一個迎合中國簽定貿易協定，此為1953年透過德國經濟東方協會（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和中國的國際貿易促進協會（Ausschuss zur Foerderung des internationalen Handels）所簽署的協定（Majonica, 1975: 341-45），然而由於美國這個主要盟國的干涉，以及中國政府希望該貿易協定升級到政府層次，一年後該協定遂無法繼續延長，不過德國在遠東只想當一個國際事務的中立者，不願太更跟從美國的中國政策，而為它預留了和中國接觸的空間，加上1964年5月德中外交官都反對蘇聯勢力，從而開啓德國與中國在瑞士伯恩展開對話的機會（Fabritzek, 1972: 18），中國談判官員因而獲得德國官方簽署商品協定。

其後，德國和中國的貿易，雖然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國禁運政策以及中國偏好和邦交國貿易往來的影響，1970年德國對中國出口總額計6億1,210萬馬克，而德國從中國進口總額計3億860萬馬克；1971年德國對中國出口總額計4億8,220萬馬克，而德國從中國進口總額計3億3,030萬馬克。

然而，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獲得常任理事國，各國爭相前往北京訪問，隔年美國尼克森總統亦訪問中國，從而影響到德國對中國政策，同樣地北京也希望德中關係能夠朝向正常化，因此在雙方艱苦談判下，1972年10月德國外交部長許爾（Walter Scheel）訪問北京，德中即達成將雙方關係提升到大使層級，正式完成兩國建交（孫秀民，1994：28-29），德國和中國也簽署正式的貿易協定，當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升到約20億馬克。

自從德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外交以來，德國奉守一個中國政策，與

台灣的中華民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²。雖然德國不在國際法上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法律地位，不過德國為台灣歷年來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國，反觀台灣則為德國在亞洲地區第五大貿易夥伴國，2011 年德台雙邊的貿易總值達 162 億 9,622 美元，台灣對德國的出口貿易為 68 億 6,877 美元，台灣對德國的進口貿易為 94 億 27,447 美元，台灣的貿易逆差計 25 億 5,866 美元（國際貿易局，2013）。同時，德國在台北設立德國經濟辦事處，此為德國駐外商會（Deutsche Auslandshandelskammern）在台之分支機構，另外有台北的歌德學院，從事語言和文化的推廣工作。

二、德中經濟需求與往來日益增強

自從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科爾（Helmut Kohl）總理的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通常只是口頭說說，反而強調貿易和投資可以帶來中國的和平演變（Kohl, 1995: 11）。待當年秋季在德國企業界的壓力下，德國政府在歐盟投下反對制裁中國的票，同時德中兩國外長在聯合國大會恢復會晤，德中往來開始恢復起來（Moeller, 1997: 718）。再者，德國工業人士遊說政府，要求放鬆限制武器和軍民雙重使用器械的出口，其實賓士汽車公司和人民解放軍早就合資生產卡車，所以 1992 年起中德關係有進一步的改善，雙方走上正常的發展道路，中國江澤民主席和德國科爾總理開始互訪，政治關係的改善，也推動其他領域的互動，尤其是經貿關係的發展。

首先，就政治關係而言，1993 至 1998 年德中雙方領導人總共 52 次晤談，中國訪問德國的領導人計江澤民總書記、喬石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以及李鵬總理等；同時，德國訪問中國的領導人則有赫爾佐克（Roman Herzog）總統、科爾（Helmut Kohl）總理以及金克爾（Klaus Kinkel）外長與霍模（Ludger Volmer）副外長等，其中德國科爾總理在 1993 與 1995 年兩度訪問中國，1998 年就任的施諾德（Gerhard Schroeder）總理則三度訪問中國，

² 1941 年 7 月 1 日，德國承認汪精衛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二次大戰德國戰敗，分成東西德，東德於 1950 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戰後西德是當時少數未與台北、北京其中之一建交的西方國家，目前中華民國與德國分別於台北與柏林互設代表處。

另有費雪（Joschka Fischer）副總理兼外長、沙爾平（Rudolf Scharping）國防部長與穆勒（Werner Mueller）經濟暨科技部長訪問中國，同一時期由中國訪問德國的則有朱鎔基總理、唐家璇外長、吳儀國務委員、尉健行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胡錦濤國家副主席。

再者，90年代德中雙邊貿易日益增加，而且中國對德國的貿易出口更是重要，因而形成中國對德國貿易出現巨大的順差。以商品的性質而言，90年代底德國對中國的出口貿易，主要是機械和電子設備占50%，汽車則占10%，具體地說1/2以上出口到中國的德國產品，由約12個主要公司產銷，包括西門子、福斯汽車、巴斯夫公司（BASF）、赫斯特集赫斯特集團（Hoechst）、拜耳集團、曼內斯曼德馬格（Mannesmann Demag）公司以及施勒曼—西馬克公司（Schloemann-Siemag）等（Parnell, 2002: 351-63），德國投資中國獲利的表現主要在汽車工業，其次有電器產品、化學工業以及機械工業等；反觀中國對德國的出口貿易，產品類別十分多，且以勞力密集產品占多數，不久之後紡織品和衣服喪失對德國出口的重要性，高品質的製成品變成占90%，這主要由外資企業對中國的出口貿易作出的貢獻，它們占中國總出口貿易的40%以上（Taube, 2001: 11-12）。

此外，從1998年以來，德中雙邊關係持續進展，譬如2003年北京和柏林強烈地反對美國進兵伊拉克，而且從前一年的下半年以來，中國是德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而德國則是中國在歐洲最重要的貿易夥伴（Blume, 2005: 25-28）。由於中國存在廣闊的市場，德國公司長期將它作為生產國，同時逐漸地也將中國當作其研發場域。待2004年德國施諾德總理和中國溫家寶總理共同發布宣言，兩國的關係被描述成「全球責任下的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global responsibility）。

三、德中互動關係的制度化

德中關係自從90年代雙方經貿往來的增強，彼此之間陸續發展論壇、對話與高峰會等，其中許多是建立在資深政府官員層級，像部長、政務次長與總理等，譬如德中工商高峰論壇、德中經濟技術合作論壇與德中工商高峰論壇等（Auswärtiges Amt, 2003）。從2004年開始的德中論壇，每兩年

舉辦一次，出席的有教育、科技部長與政府代表等，雙方有可能簽署政府和經貿協議，是經濟合作的主要平台；2011 年啓動的德中政府之諮商會議，雙方輪流主辦，由相關的部長參與，也可能簽署協定，有助於充實戰略夥伴關係。至於雙邊的對話機制，迄今已達 40 個，其中許多屬於高級政府官員，譬如部長、政務官以及政府首長層級，而類型則有戰略對話、高科技對話、法制對話與人權對話等。從 1999 年開啓的法制對話，由兩國市民社會的著名代表參與，舉辦法律研討會，曾經談及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也會促成培訓中國的法官或行政官員的進修。2011 年舉辦第 11 屆法治對話以及當年的兩國市民社會的知名人士代表的以對話化方式的論壇進一步強化了彼此的合作 (Schulte-Kulmann, 2005: 23-30)；從 1999 年開啓的人權對話，每年舉辦一次，論及基本權利、死刑，曾經有遭取消舉辦；從 2006 年開啓的外長級戰略對話，涉及範圍廣泛，包括國際局勢與經貿議題等。再者，德中雙方高層官員互訪頻繁，除了聯合國大會期間的會晤，還會利用像亞歐會議 (ASEM) 期間召開雙邊總理與外長的高層會議。

此外，德國為維護與促進在中國的商業利益，由民間的德國工業暨貿易協會聯合會 (Deutscher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tag) 在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分別設立代表處。再者，德國官方的聯邦貿易暨投資署 (Germany Trade and Invest) 也派出負責外貿的官員駐北京、上海和香港的辦公室，以及負責投資的官員駐北京的辦公室，德國工業暨貿易協會聯合會的表處和聯邦貿易暨投資署的辦公室都和德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以及駐上海、廣州、成都和香港的總領事館密切配合工作。其次，在中國的德國公司則自行設立工業暨商業協會 (Chamber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由德國駐北京的工業暨貿易代表負責領導，另外在香港設有德國商業協會。

參、梅克爾總理從與中國的政治波瀾到強化經濟

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出生於前東德，學習物理，牧師的女兒，德國再統一之後，加入全德國的基督民主黨，由當時科爾總理提拔進入內閣任職，不過當基民黨遭遇政黨捐款醜聞危及該黨領導人形象時，梅克爾卻

能勇於公開聲明與科爾等人劃清界限，從而贏得各方稱讚，遂被基民黨推為總理候選人，2005年順利當選為德國第一位女性總理（Mills, 2007: 3）。雖然梅克爾是來自前東德的總理，但是她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深信西方自由、人權以及民主的價值，就像許多來自中東歐人士，梅克爾是一位對美國有積極觀感的人，在前東德時期的個人經驗中，她知道自由和獨裁之間的差異，而且她不會信任一位試圖想控制社會和經濟的人。

自從梅克爾在2005年當上總理，她即著手修復反對協助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德美關係，這多少基於她對美國的自由和民主之認同，她也多次訪問美國。至於梅克爾的聯合政府與中國高層的互動，在隔年2月首度展開，梅克爾最初對德國與中國的關係表示，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她強調德國方面了解海峽兩岸問題需由北京和台北共同努力，透過和平的方法自行解決。不過，梅克爾卻不同於過去社民黨施諾德總理，不贊成歐洲聯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

當梅克爾總理首次前往中國訪問時，由9位內閣和2位政務官陪同進行兩天的政府諮商，顯示德國對中國的重視，此時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已有相當大的轉變，德國不再視中國僅為其商品推展的市場和廉價產品的供應國。中國對德國政府而言，現在是它在西方世界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夥伴之一。相反地，中國領導人亦視梅克爾總理為它在歐洲接觸的核心人物。可是，梅克爾總理此行公開對中國談及人權議題，更主動在德國駐北京大使館會見20多名民間社會的領袖，包括媒體、環保人士以及維權人士等，這是西方領袖首次接見中國的非政府人士，梅克爾參訪非政府組織以及和異議人士與獨立記者晤談，對於中國境內正在興起的民間力量有所鼓舞，也是一種新型的外交作風，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此熱烈的反應，此時仍不致於對德中關係產生不良的影響。

一、人權外交揭開德中關係的不睦

當2007年8月梅克爾總理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她開始較以前更加談論人權的議題，除了強調人權、宗教以及言論自由，也接見開明的媒體人士，顯示出梅克爾總理對中國採取價值取向（value-driven）的人權外交，這就

成爲接下來德中關係爭議的序幕。

在一個月之後，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問德國，雖然中國警告德國政府，但是梅克爾總理仍然堅持在總理府以總理身分接見，並與達賴喇嘛進行會談，成爲德國第一位正式接見達賴喇嘛的總理。爲此，中國溫家寶總理表示，梅克爾總理的行爲是一種挑釁，應該認錯向中國道歉 (Deggerich, et al., 2012)。其後，中國取消原訂在德國舉行的中德雙邊司法部長對話、雙方原先計畫不同級別的會議和高層會見，包括中德戰略對話、人權對話以及雙方外長在聯合國大會期間的早餐會等，使得德國本身被迫取消 12 月訪問中日韓三國的計劃。

此時，由基民黨／基社黨和社民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組成的聯合政府，其中執政的基民黨／基社黨國會黨團爲了支持自己的總理，主動發表〈亞洲：德國和歐洲的戰略挑戰和機遇〉 (Asien als strategische Herausforderung und Chance fuer Deutschland und Europa) 報告 (Asienstrategie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 2007)，明確提出價值觀外交，建議聯合政府應該加強和印度、印尼、日本、南韓與澳洲等亞洲民主國家往來，改變過去德國過度重視中國，忽略其他新興亞洲經濟體的作法，並且需聯合歐美與亞洲的民主國家共同努力，以防止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崛起，進而導致周邊的不穩定，一般認爲梅克爾總理從此正式走上「價值觀外交」。實質說來，梅克爾總理要推行的亞洲政策，是帶有西方意識形態的色彩，這個新路徑無異於摒棄施若德和科爾兩位前總理實用主義的德中政策，所以從梅克爾總理的身影，吾人可以看到她試圖阻止中國崛起的「西方敵對勢力」的影子，然而聯合政府中社民黨的史坦邁爾 (Frank-Walter Steinmeier) 擔任外長，注重的是德中雙方關係的「穩定」，不太能適應梅克爾總理強調外交政策的「價值」導向，於是兩個執政黨難免有所齟齬。有鑒於此，基民黨／基社黨的「亞洲：德國和歐洲的戰略挑戰和機遇」報告，無可諱言一定程度惡化了德中關係的進展。

二、德中雙方經濟與文化持續進展

無可否認，長期以來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中國則是

德國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國，雙方不但經貿合作日益增加，而且 2005 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 620 億歐元，2006 年增加到 762.7 億歐元，2007 年更增加到 863 億歐元；2006 年德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為 129 億歐元，2007 年提高到 151 億歐元；反觀 2006 年中國對德國的直接投資為 3.09 億歐元，2007 年提高到 4.28 億歐元。在 2006 到 2007 這兩年之間，德國是歐盟各國對中國投資最多的國家，大部分的投資放在生產項目，像汽車、發電設備、交通、鋼鐵與化工等。至於中國投資德國，截至 2007 年主要是併購德國的企業，藉此可以獲取德國的品牌與技術等，更可以避開反傾銷的制裁，譬如中國工程機械生產商「三一重工」投資德國北威州建設研發中心和機械製造基地，以及收購德國混凝土泵生產商普次邁斯特的股權等。2007 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顯示出當年後期即使德中關係因接見達賴喇嘛產生不睦，民間的企業在貿易與投資上皆無受到影響，持續穩定地成長。

再者，德國和中國雙邊文化的交流，目地在推展兩國的文化、教育研究和社會的合作，德國透過學校夥伴、高等教育合作以及語言課程，促進雙方年輕人的交流和德語的學習，並利用歌德學院、德國學術交流基金會 (DAAD) 以及其他的夥伴組織，強化德中雙邊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兩國的大學之間有 580 個合作計畫，另外媒體的對話與論壇，也提供表達爭論性問題的機會，譬如公民參與和自由表達的權利。2007 年德國啟動的「學校：未來的夥伴」(PASCH) 創議 (PASCH-Global, n.d.)，目標在增加中國境內學德語的學生與德語教師的再教育，德國的歌德學院、外國教育事業總業務處 (Zentralstelle fuer Auslandsschulwesen) 和教育交流服務處都參與其中，由德方關照 76 個學校。直到 2011 年，中國學生選擇德語當外語約 3 萬 6,000 名，向德國大學申請入學的學生約 2 萬 4,000 名，中國成為外國學生最多的來源國。反之，僅約 4,000 名德國學生在中國大學註冊，其中 3/4 是短期進修生，能夠修習專業課程的學生只有少數。

2006 年 4 月德國第一所孔子學院，由北京大學與柏林自由大學共同成立，德方提供教學的場地，中方則提供師資與教材，當作致力於推廣漢語與文化的非營利機構，類似德國的「歌德學院」。2007 年 8 月「德中同行」

(Deutschland und China – Gemeinsam in Bewegung) 在南京由到訪的梅克爾總理揭開序幕 (China Internet Infotmation Center, n.d.)，往後三年的活動足跡遍及上海、南京與重慶等 6 個城市，舉辦過 600 場展覽會、表演與工作坊，從經濟、文化、建築與教育的觀點，探討永續的都市化課題，吸引了超過 2 百萬名觀眾，對文化與教育的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並沒有受到梅克爾總理接見達賴喇嘛的影響，活動持續順利地舉辦。

三、德中修復政治關係

梅克爾總理會見達賴喇嘛事件之後，德中關係的修復是由 2008 年初梅克爾本人在「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 訪問中表示，希望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為此社民黨的史坦邁爾外長開始展開努力，提出外交信函承諾德國高度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承認西藏和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堅決反對台灣推動加入聯合國的公投，並且不支持、不鼓勵謀求西藏獨立的任何努力，於是德中關係明顯消除過去三個多月來的不睦氣氛，德國的史坦邁爾外長遂得以和中國楊潔篪外長在柏林展開會面。

雖然 2008 年 3 月西藏爆發動亂，中國政府展開鎮壓行動，使得梅克爾總理宣布不參加北京奧運的開幕式，使得德中關係出現些許的裂痕，當年 10 月第七屆亞歐會議 (ASEM) 在中國召開，梅克爾總理第三次訪問中國，此次被定調為修補德中關係之旅 (Belkin, 2010: 1-4)。在德中雙方領導人見面下，正式宣告雙方關係的正常化。直到 2009 年德中關係進入轉變的過渡期，除了有鑒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當年德國不再對中國提供以財政援助為主的發展合作計畫，新的合作型式改成戰略夥伴的一部分，譬如支持持續改革的政策、降低生態負擔以及協助經濟體制的永續發展等。再者，當年 1 月中國溫家寶總理啓程訪問德國，雙方副外長級戰略對話接著舉辦，於是德中政治關係的高層互動漸漸回到正軌。

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 9 月德國舉辦聯邦總理選舉，梅克爾總理獲得連任，此次她改而與自民黨 (Free Democratic Party) 建立聯合政府，新政府的外長由自民黨的威斯特偉勒 (Guido Westerwelle) 擔任，由於他本人沒

有部長和外交事務的經驗，梅克爾總理得以完全控制關鍵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國、歐盟政策、跨大西洋關係、俄國、阿富汗以及中東等。此時，梅克爾總理除了繼續堅持人權的價值觀，也積極搭建良好的德中關係。

有鑒於 50 多年來德國嚴重的經濟蕭條，第二任期的梅克爾總理著手優先恢復經濟活力，雖然歐洲在金融海嘯後，各國經濟普遍蕭條，但是德國卻率先復甦，這有很大程度上係得益於對中國的大幅出口貿易（黃得豐，2010）。若謂 2008 年德中的貿易總額達 948.9 億歐元，2009 年增加到 939.7 億歐元。其次，德國對中國的直接貿易為 187 億歐元，2009 年增加到 207 億歐元；反觀中國對德國的直接投資為 5.94 億歐元，2009 年增加到 6.29 億歐元。

至於德中文化交流，除了「德中同行」的活動持續進行，2009 年 10 月第六十一屆法蘭克福的國際書展，中國以主賓國身分參加，此次書展主題為「中德文化交流」，旨在拉近中國文化與德國民眾的距離，並進一步認識當代中國的作家。中方想藉此活動展示其文化、文學與科學等圖書的柔性實力（soft power），告訴世人中國除了是經濟大國，更成為文化大國，然而德國的媒體並無特別予以報導，反而由於法蘭克福書展本意是讓相異甚至完全相左的觀點展現對話的平台，中國的言論自由成為討論的議題，因為看不到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詩人楊煉與藝術家艾未未等的作品，遂被視為此次書展的美中不足之處。

四、德中高層互訪深化經濟關係

德中關係在 2010 年提升到一個新的層面，當年 7 月梅克爾總理對中國第四次訪問，這是她連任後第一次出訪中國，此行包括將近一半的政府官員與德國前 25 大企業領導人，可看出經貿訂單為此行的重點之一。特別是在梅克爾訪問時期，北京視梅克爾總理是守信用的政治家，溫家寶總理陪同她參訪天津—溫總理的故鄉，這是少有的外交榮譽。在訪問過程中，中國積極爭取德國承認中國的市場占有經濟地位，而德方則呼籲中國保護智慧財產權，努力防治盜版與避免傾銷等，兩國政府的相關部門和企業界簽署了財政、環保與文化等領域高達百億美元的十項合作協議，梅克爾總理

也與中國民間 4 位維權人士會面，探討網際網路與言論自由的重要性。此次訪問結束時，梅克爾總理更與溫家寶達成『中德關係全面推進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公報』(Federal Foreign Office, 2013a)，這是德中建交以來第二份的公報，除了將定期對話機制層級提升為部長級，並確定建立中德政府的磋商機制。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2010 年 10 月中國溫家寶總理訪問希臘、比利時與義大利等，卻突然改變行程飛往德國進行閃電式訪問，距離柏林 70 公里外的梅賽堡宮 (Schloss Meseberg) 被當作會見場所，這個國家賓館是德國用來接見關係最密切的外國領袖，足見中德逐漸形成密切的戰略夥伴關係。德中雙方進行的會談，主要就經濟議題加以討論，中方表示願意解決歐洲企業在中國設廠、公共採購差別待遇的問題，德方則表示願意支持歐盟儘快在 2016 年前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黃得豐，2010)。

至於在高層互訪上，2011 年 1 月李克強副總理作為下一任總理人選訪問德國等歐洲國家，在德國四天與總理、總統、外長、經濟部長會面，並出席中德商界的晚宴。此行除了表示希望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以及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簽署了 11 項價值 87 億歐元的商業協議 (BBC 中文網，2011)。

再者，2011 年 4 月中國與德國外長共同主持第一回的部長級戰略對話，這項對話是依據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所舉行的，反映出中國對於德國的重要性，緊接著中德首輪政府磋商的召開，6 月間梅克爾總理歡迎溫家寶總理前來柏林從事首次的德中政府首長會議，中國由 13 位部長與央行行長周小川等組成的 300 多人代表團，該團也為了第 6 屆中德經濟論壇，德方則派出 10 位部門首長與之對話，經濟界的代表則包括巴斯福、西門子、賓士與福斯等公司，可以看出雙方對彼此的重視，這次政府間對話達成八項共識，並簽署近 20 項合作文件。這樣的政府間磋商機制，德國除了在歐洲境內與五個國家共同設立，其他的僅與以色列與印度有此機制。12 月間德國外長韋斯特韋勒 (G. Westerwelle) 為廣泛的戰略諮商，也接待了中國外長楊潔篪。

從 2012 年起，德中關係明顯地升溫，更互稱為德中關係的新起點。德

中雙方高層訪問的頻繁，當年 2 月德國梅克爾總理應溫家寶的邀請進行第五次訪問中國，基於中國是聯合國 5 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國際重要的議題扮演決定性角色，譬如在商議伊朗的核子計畫與討論敘利亞的未來，尤其是普丁當上俄羅斯總統以來，對西方世界立場強硬，所以梅克爾總理希望在伊朗與敘利亞問題上爭取中國的支持，同時為歐債危機請求中國援助，中國的評估則較願意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或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等參與解決歐洲債務問題。在人權問題上，此次訪問並無太大進展。

此外，在德中經貿的合作方面更是穩定地成長。2010 年德中貿易額突破 1,310.61 億歐元，2011 年則增加到 1,432.8 億歐元，其中德國對中國的出口貿易達 640.8 億歐元，而中國對德國的出口貿易達 792 億歐元，兩國貿易的前景樂觀，而且雙方互相投資額均較過去增加。德國企業的估價偏低，中國會加強在德國的收購，而出現一些收購案，阿爾迪超市的電腦供應商 Medion 最近就被聯想收購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主權投資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投公司）掌握了 4,600 億美金，最近以 500 億美金投資歐洲的專案，而德國汽車製造商戴姆勒正在為手中 5%至 10% 的股權尋找新買主，中投公司是它在中國尋找大股東的首選，而且中投公司也對這個德國傳統汽車品牌賓士的母公司感興趣（林泉，2011）。

至於文化交流方面，大型文化交流活動除了前述「德中同行」的活動在 2010 年正式結束，當年 8 月起德國的北威州電視台（NRW TV）開始每天播放一小時節目「來看吧—中國時間」，內容有中國社會民生、文化藝術與旅遊名勝等，但不涉及政治。再者，2011 年 4 月「啓蒙藝術展」（Die Kunst der Aufklärung）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正式揭開序幕，展期一年，但是展覽的作品經過中國官方審查，西方媒體認為這是一次浪費的機會。

此外，2012 年為中德建交 40 年，中德雙方合作在德國舉辦「近觀中國—2012 德國“中國文化年”」系列活動（Federal Foreign Office, 2013b），為期一年，涵蓋音樂、藝術設計、文化對話以及戲劇舞蹈等，於德國各大城市舉行，開啓兩國文化交流史的里程碑，也可以稱作對「德中同行」活動的一項回應。

肆、結論

德國對中國的關係近年來有長足的發展，這基本上由於雙方沒有地緣戰略的顧慮，因此經濟因素成爲驅動德中關係的主要力量。一方面，中國需要德國的科技，以持續進行現代化，尤其是德國機械產品和汽車的銷售市場；另一方面，中國製造的產品出口到德國或併購德國企業等，對中國亦有實質的意義與價值。再者，德國和中國發展成戰略夥伴關係，德中雙邊關係是緊密的，包括最高的政治層次，尤其是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 (IMF)、世界銀行 (WB) 與二十國集團 (G20) 有更大的發言權，德國因而和中國維持密切的政治與經濟接觸。

雖然德國的中國政策，需顧及歐盟對第三國所採取的共同政策之限制，吾人仍可看到梅克爾總理主政時期，德國對中國政策所顯示出的特色：

1. 有鑒於德國工業製品需要中國這個新興的廣大市場，但是爲了規避中國工業政策所設下的市場通路障礙，德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逐漸地採取增加對中國直接投資的金額，最近出現大型投資計畫即顯示這些公司欲長期駐留中國，同時認定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在增加之中。若論及經濟上阻撓德國投資中國的意願，主要在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法律的不確定性、服務業的限制、貪污以及缺乏透明性等 (Blume, 2005:28)。同時，德國公司認爲中國有需要增進法制、改善透明性、確保投資者的安全、給予更多的契約自由以及和中國公司相同的公共投標管道等；
2. 中國是德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經濟夥伴國，它對德國經濟和政治的重要性，是影響德國對中國政策的因素，不過這也決定於德國的壓力團體和政府政策所欲獲得的利益。當 2008 年之後歐洲身陷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梅克爾總理訪問中國受矚目，因爲中國擁有外匯儲存達 3.23 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一；
3. 德國是歐洲最大和最強的經濟體，也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國，德國對中國的重要性，在於其經濟和政治上爲中國到歐洲的通道，中國爲解除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找上遊說德國，溫家寶總理也曾經向到

訪的梅克爾總理抱怨歐盟未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以及布魯塞爾不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迄今，德國是歐盟境內最大的市場，而且德國更是歐盟國家中，對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和科技關鍵的供應國，不過德中雙方也逐漸成為競爭者，特別在工程產品，這也是德國傳統強項³；

4. 實際上，梅克爾總理本人與中國時常玩「雙重遊戲」，一方面和中國握手言歡；另一方面則籲請推動歐洲聯盟要團結準備好因應國際的挑戰，這種德中的雙人舞（*pas de deux*）對於其他歐洲夥伴國並不是滋味（Ulrike, 2012）。如果德國著重的是，自己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而不太考慮歐洲的共同戰略利益，這是會影響歐盟國家整體對中國的戰略思考，不會是歐盟所樂見的事。有鑒於此，德國對中國的價值觀訴求，即所謂中國的人權、司法或民主等，可能從而成為次要的課題。

德國與中國關係走過 40 多年，由於 90 年代中國經濟的開放，不但吸引海外直接投資，而且日益成為製造基地，尤其是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進出口貿易劇增，促成其國際經濟與政治分量提升，德國在梅克爾總理主政以來，維持和中國更密切的政經關係，此種關係在中短期內不致於明顯地改變。至於台灣所處的環境，因為對外使用中華民國國號，德國對台灣採非官方政策不易改變，這是國際法的問題，需要台灣自己內部面對，以及有智慧的解決，如此才可能增進台灣的國際空間，以及開創出新一波的發展動力。

³ 參見 Peel 與 Rabinovitch (2012) 。

參考書目

- 國際貿易局，2013。〈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http://cus93.trade.gov.tw/FSCI/>) (2013/4/24)。
- 林泉，2011。〈中國利用金融實力出擊〉 *Deutsche Wele*, December 29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34549,00.html>) (2013/5/16)。
- 張莉，2013。〈中國外貿企業在競爭中成長〉(http://www.caitec.org.cn/c/cn/news/2013-01/25/news_3798.html) (2013/5/16)。
- 孫秀民，1994。〈中德關係及其發展〉《外交學院學報》4 期，頁 28-29。
- 黃得豐，2010。〈歐中(國)政經關係之回顧與展望〉國政研究報告，財金(研)099-023 號 (<http://www.npf.org.tw/post/2/8305>) (2013/4/24)。
- Asienstrategie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 2007. “Asien als strategische Herausforderung und Chance für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eschluss vom 23. Oktober (www.cdusu.de/GetMedium.aspx?mid=901) (2013/5/16)
- Auswärtiges Amt. 2013. “China – ein Land mit vielen Gesichter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RegionaleSchwerpunkte/Asien/ChinaRegionalschwerpunkt_China_node.html) (2013/5/16)
- BBC 中文網，2011。〈李克強訪德，兩國簽 87 億美元合同〉(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1/01/110108_china_germany.shtml) (2013/5/16)。
- Belkin, Paul. 2010.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rends and Transatlantic Implic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AD=ADA517335>) (2013/4/24)
- Blume, Andreas. 2005. “Germ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 from a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 A Practitioner’s View.”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Dialogue*, Vol. 6, No. 16, pp. 23-29.
- 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 n.d. “Deutschland und China – Gemeinsam in Bewegung.” (http://german.china.org.cn/international/archive/dezhongtongxing/node_7044144.htm) (2013/5/16)
- Deggerich, Markus, Ralf Neukirch, and Wieland Wagner. 2012. “Berlin’s Cozy New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Spiegel Online*, August 29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angela-merkel-trip-to-china-to-test-strength-of-growing-ties-a-852288-2.html>) (2013/4/24)
- Fabritzek, Uwe G. 1972. *Gelber Drache, Schwarzer Adl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Muenchen: Bertelsmann.
- Federal Foreign Office. 2013a. “China.” (

- Nodes/China_node.html#doc474918bodyText1) (2013/5/16)
- Federal Foreign Office. 2013b. "China: A Nation with Many Faces."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sid_AFBA6AA1410868659FB0CBF843E184B6/EN/Aussenpolitik/Regionale_Schwerpunkte/Asien/China/Regionalschwerpunkt_China_node.html) (2013/1/23)
- Frey, Rainer. 2005. "China's Growing Importance for German Investment." CESifo Forum, Vol. 6, No. 3, pp. 49-54 (<http://www.cesifo-group.de/ifoHome/publications/journals/CESifo-Forum/Archiv/CESifo-Forum-2005.html>) (2013/4/24)
- Guérot, Ulrike. 2012. "Germany Trips Up EU on China Ties." *World Politics Review*, September 24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2361/the-continentalist-germany-trips-up-eu-on-china-ties>) (2013/4/24)
- Majonica, Ernest. 1975. "Die Bundesrepublik und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in: Hans-Peter Schwarz, hrsg. *Handbuch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pp. 341-45. Muenchen: R. Piper & Co.
- Mills, Clifford W. 2007. *Angela Merkel*.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cations.
- Moeller, Kay. 1997. "The West and China: Crusaders and Cynic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9, No.3, pp. 351-68.
- Moeller, Kay. 1998. "Germany's China Policie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 in: *Managing Conflict, Building Consensus: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Challenges for Germa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1-15.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http://www.aicgs.org/site/wp-content/uploads/2011/11/china_conference.pdf#page=12) (2013/4/24)
- Parnell, Martin Francis. 2002.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The Modern German Experience."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Vol. 14, No. 5, pp. 351-63.
- PASCH-Global. n.d. "Schülerzeitungen weltweit." (<http://www.pasch-net.de/mit/de3343641.htm>) (2013/5/16)
- Peel, Quentin, and Simon Rabinovitch. 2012. "China and Germany to Forge Closer Ties." *Financial Times*, April 20 (<http://www.ft.com/cms/s/0/20b68c7c-8a0d-11e1-87f0-00144feab49a.html#axzz2TSR2WXDC>) (2013/5/16)
- Schulte-Kulmann, Nicole. 2005. *Rechtszusammenarbeit mi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Deutsche und amerikanische Initiativen im Vergleich*. Goettingen: V&R unipress.
- Taube, Markus. 2001.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and Mainland China, 1979-2000." *Duisburger Arbeitspapiere zur Ostasienwirtschaft*, No. 59 (http://www.econbiz.de/archiv/du/udu/fiwentwicklung/economic_relations_china.pdf) (2013/4/24)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The Era of Chancellor Merkel (2005-12)

Chiu-Ching Kuo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WAN*

Abstract

Economic factor is the main force to dri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On one hand, China needs German technology to maintain its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machinery products and cars etc.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products export to Germany or merge with German enterprises. All of this is meaningful to China. Germany is the largest economy in Europe and is the largest trade partner of China. After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1972, German-China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with frequent high-level political exchange as well as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except the period of Tiananmen Square Event of 1989. The paper is to explore their trade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Merkel (2005-12).

Keywords: German-China relations, Chancellor Merkel, German China policy